

CHINA
ECONOMICS POLICY

共和国经济 大决策

王瑞璞 郭德宏 / 主编
季晓楠 张湛彬

[第二卷]



中国经济出版社



共和国经济 大决策

王瑞璞 郭德宏 / 主 编
季晓楠 张洪彬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S POLICY





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鉴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严重的经济困难状况，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出了“吃饭第一、建设第二”的经济发展思路。图为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在会间一起交谈。



1961年4月，邓子恢在福建龙岩做调查期间向龙岩地委机关干部宣讲《农村工作六十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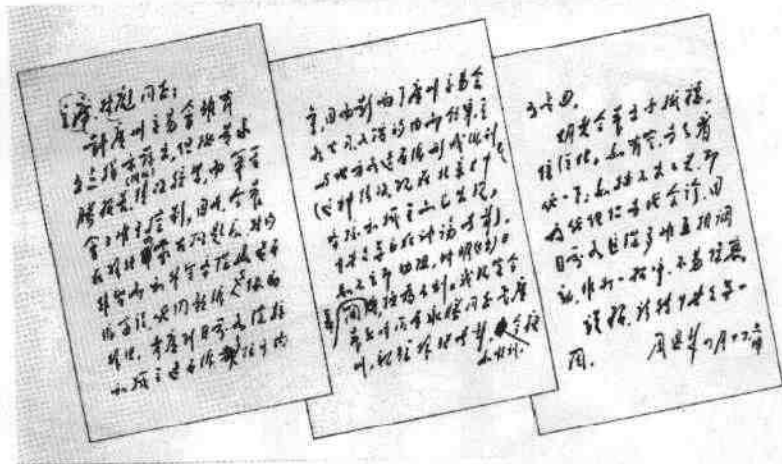
1961年5月8日,刘少奇在回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进行调查研究的路途中。



1961年7月,邓小平在康世恩的陪同下视察大庆油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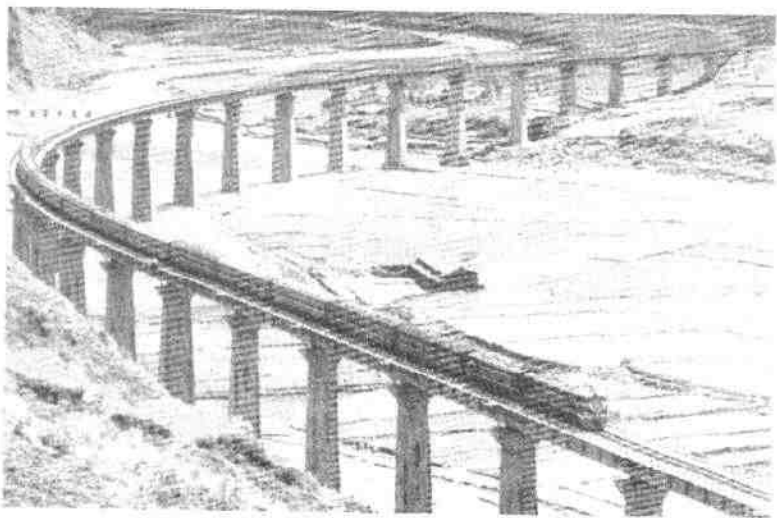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周恩来在会上针对浮夸风等不良倾向，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在主席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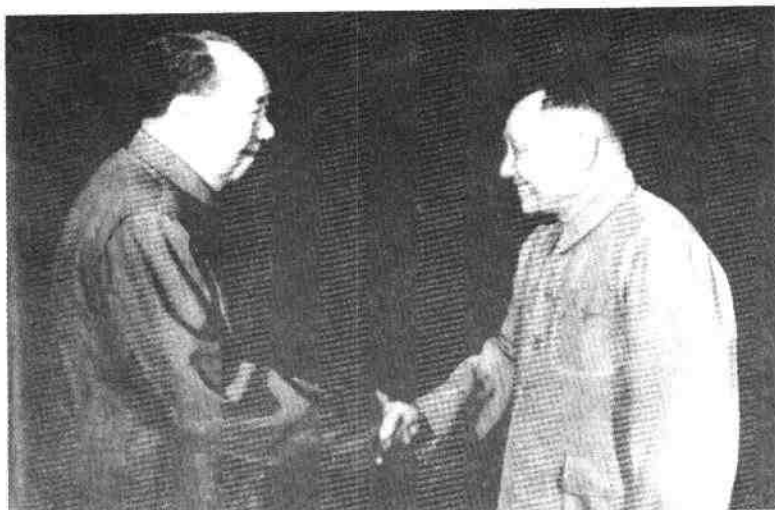
1967年4月，周恩来为排除动乱对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干扰和破坏，亲往现场指导工作，图为行前给毛泽东、林彪的信。



1968年12月22日,新华社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会宁县城镇的191户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随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70年成昆铁路胜利建成通车。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初,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后,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整顿。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中国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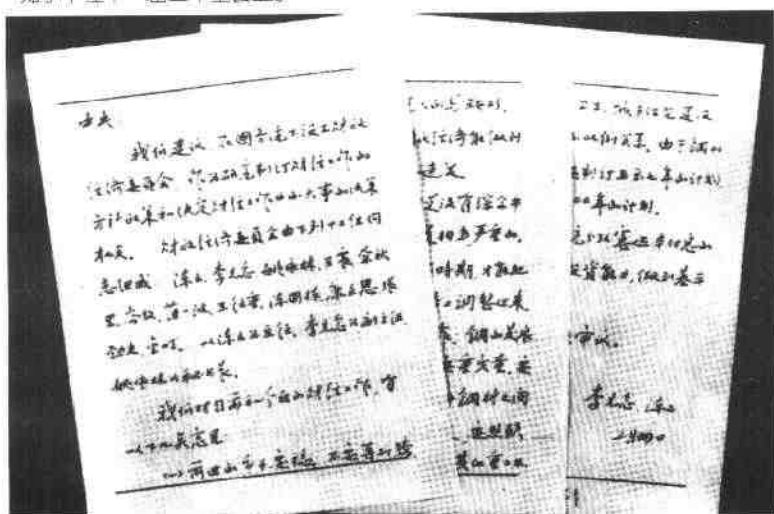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报告。



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商品极度缺乏,各种票证应运而生。票证——短缺经济的见证。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与此相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倡议下,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此取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全会拉开了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序幕。图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陈云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相当严重,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进行调整。图为李先念、陈云给中共中央的信。



1978年2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休息期间,邓小平与四川省人大代表一起畅谈农村改革(前排中为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辑委员会副主席兼副总裁弗·布·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林达光时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目
录

2

□ 《农村六十条》的制定	1
□ 《工业七十条》的诞生	45
□ 六十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局限	73
□ 关于发展商品经济的一些探索	86
□ 1963—1965 年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决策的形成及实施	97
□ “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	116
□ 刘少奇对六十年代调整的贡献	132
□ 毛泽东、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思路的比较	145
□ 大寨典型的树立与“农业学大寨”口号的提出	157
□ “五·七指示”提出了新的经济体制模式	178

★ 共和国经济大决策 ★

□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国民经济	189
□ “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提出	207
□ “红旗渠”——人造天河的建成	223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227
□ 编制第四个五年计划	239
□ 中央直属企事业下放地方管理	244
□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249
□ 艰难中发展的军事工业	254
□ 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一次高潮	267
□ “革命搞好了，生产就可以下降吗？”	279
□ 邓小平创造出“三项指示为纲”	292
□ “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总体概况	316
□ 邓小平 1978 年的“北方谈话”	361
□ 1977、1978 年经济理论大讨论	372
□ 邓小平与中国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	387
□ 万里、赵紫阳等对农村改革的大胆尝试	400
□ 陈云的发言与经济工作大转折	432
□ “洋跃进”与十年规划的新失误	443
□ 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决策的形成	458

□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	474
□ 农口干部座谈会引发的争论	487
□ 一份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	504
□ 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	526
□ 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态度	536
□ 企业本位论	542
□ 改革初期对于企业一长制的考察	568
□ “计划外产品”走进流通	588
□ 我们为什么调整生产结构?	602
□ 新“八字方针”的提出	612
□ 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经过	632
□ 筹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	650
□ 陈云与社会主义新时期经济	681
□ 邓小平提出把知青纳入城镇就业轨道	699
□ 对农业学大寨问题的初步总结	729

《农村六十条》的制定

60年代初，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后简称《六十条》或《农村六十条》）草案和修正草案，是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它的制定和试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几亿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续三年的严重灾祸、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十年“文化大革命”大动乱中，农村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农业所以能够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同《六十条》继续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虽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六十条》对错误的纠正尚不彻底，其解放生产力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但是，它的历史作用应当充分肯定。

在这个条例的起草、修订、再修订的一年零九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毛主席的主要精力用于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全党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谱写了我们党调查研究史上的新篇章。条例的起草、修订、再修订的过程，就是通过调查研究，对错误认识的深化、再深化的过程。在大量的调查材料面前，终于使我们党把过去单凭政治热情和浮夸不实的材料所构想的许多错误观念和做法，一个又一个地纠正过来了，并把这些认识成果用条例形式固定下来，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这个决策程序和方法，是科学的，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回味、继承和发扬。因此，我不惜篇幅，回顾当年通

过调查研究，纠正一个又一个错误的过程。

但是，也应看到，60年代初对人民公社错误的纠正是不彻底的。尽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是智慧过人的，而且当时为纠正错误又投入了那么大的力量，但仍然有几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没有突破，以致人民公社还继续保存下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根据广大农民的伟大创造彻底解决问题。前后历时20多年。这至少可以说明：即使是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那样的伟大人物，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完成的，探索也是艰辛的。我不惜篇幅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也含有希望读者理解探索之艰辛的用意。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第一个硕果

由于农业大幅度减产，“共产风”一度有所收敛后又重新刮了起来，1960年夏，中央和地方一些负责同志就去基层作过调查。1960年11月15日，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就明确提出：“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省委不明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在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和随后4天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主席表扬湖北省委对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共产风”的调查，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河北省宝坻县（今属天津市）江石窝生产队的调查，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主席率先身体力行。他告诉田家

英、胡乔木、陈伯达，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10天至15天为期，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然后到广州会合。这三个调查组出发时，每组7人，共21人，除组长3人外，组员有邓力群、许立群、王力、张超、梅行、王录、杨波、胡绩伟、逢先知、吴介民等。后来，有关中央局和省委也有一些同志参加，如参加浙江组的有华东局农委副主任董家邦，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薛驹等。

三个调查组于1961年1月21日离京赴农村。1月26日晚，毛主席也带着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紧迫心情，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24日到达广州。在这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他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7个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了话，作了一路的调查研究工作和调查研究的动员工作。

这一时期，有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3月10日，毛主席主持的“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会议在广州开幕；与此同时，由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同志主持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开幕。两个会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11日，毛主席把当时刚刚找到的、他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加上批语，印发给“三南”会议各同志。

毛主席刚到广州时，就看到中央广东调查组2月19日报送给他的《调查纪要》。《纪要》提到：“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下而上的‘共产风’问题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关于队

与队的平均主义，《纪要》举例说：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是由原来的两个高级社合并起来的。一个在山上，副业门路多，收入高，原来一个劳动日1.2元；另一个在平地，副业门路少，收入低，一个劳动日0.7元。合并后，收入都降低了，而且降成一样，都是0.4元，两个大队的社员都有意见，收入降低多的社员意见更大，关于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纪要》认为：主要表现在供给与工资的比例、公共食堂的某些制度上。大沥公社平均每月共发工资500元，可是按人口平均供应的粮食、菜、油、盐、柴，合计每月2600元，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还占不到总分配数的20%，而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供给部分却占了总分配数的80%多。公社干部认为，“劳动力强的和弱的都一样地吃，能挑百斤泥的人没有劲了，劳动力弱的也不积极，有些人就‘走自发’，谁也瞧不起工分了。”据典型调查，农村里劳动力多、人口少的家庭和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大体都占农户总数的40%左右。人民公社要分配合理，重点就是处理好这两类户之间的矛盾。《纪要》提供的这些情况和所做的分析，受到毛主席的重视。他察觉到：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规定的12条，只解决“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即平均主义的问题。

3月13日上午8时，毛主席给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并“三北”会议各同志写了一封信。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省、地、